



“情系革命”的瞿秋白



瞿秋白烈士。

情深义重的革命伴侣

深入“认识”瞿秋白，是从“秋之白华”开始的。瞿秋白曾刻下一枚“秋之白华”的印章，寓意与杨之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一段感人至深又来之不易的感情。在当时人们思想相对保守的情况下，优雅执着的瞿秋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三则启事，昭告与杨之华的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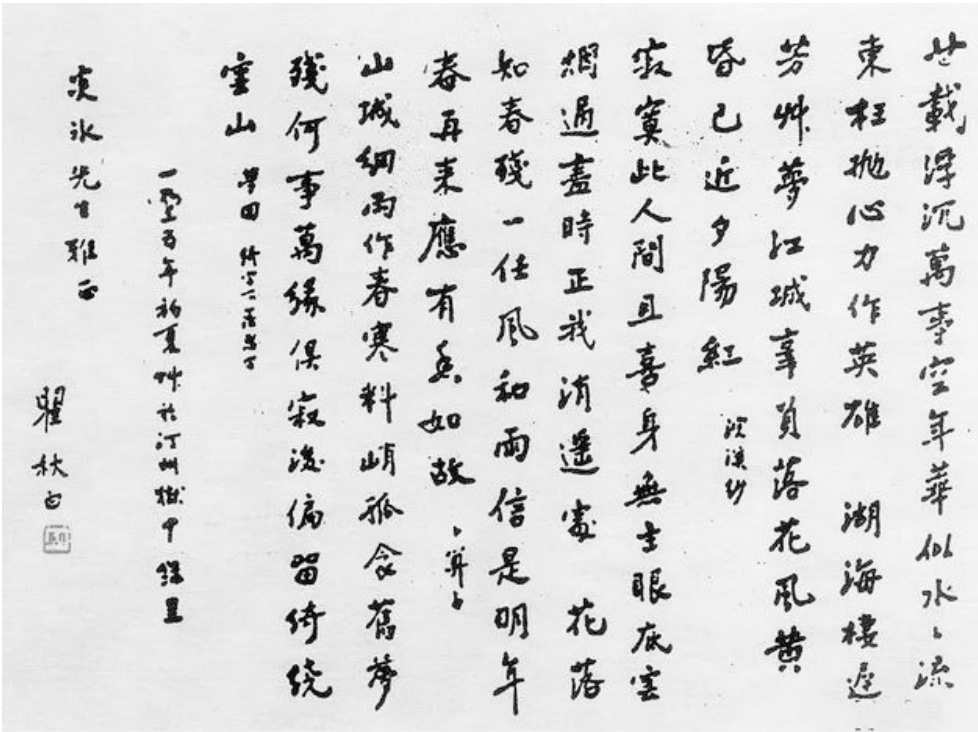
杨之华是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生于浙江省萧山县坎山镇，聪慧活泼，性格温柔。先前遵从父母之命嫁给杨家世交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为妻。沈杨虽然青梅竹马，但成长过程中，思想差距逐渐拉大。杨之华追求进步，向往苏俄，具有革命的气质。参加过萧山农民运动，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发表过宣传妇女解放的文章。1924年1月，在沈玄庐的帮助下，考上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成为瞿秋白的学生。在上海大学的学习生活过程中，一方面，杨之华跟丈夫之间从生活方式到思想境界裂痕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作上的接触，瞿秋白以他学贯中西的博学多识，经历过赤俄熏陶的革命气度，加上雄辩的口才和充满逻辑力量的思想，逐渐走进了杨之华的心中。

而此刻的瞿秋白，浑然不知。1924年秋，瞿秋白爱妻王剑虹因严重肺病在上海去世，作为王剑虹同学兼好友的杨之华在王剑虹病重期间，多次看望并照顾过王剑虹，她目睹了王剑虹病逝带给瞿秋白的沉重打击。很长时间，瞿秋白都没有从这种悲伤中走出来，此时杨之华的陪伴则给予他极大的精神支持，缓解了他失去亲人的痛苦，帮助他重新面对新的生活，投入到国共合作的紧张工作中。在极端的斗争环境里，瞿秋白与杨之华这对各自心怀伤痛又志趣相投的革命师生由异性友谊发展到相互爱慕。于是，杨之华萌发了先离婚再与瞿秋白结婚的想法。在邵力子的支持和建议下，瞿秋白随杨之华回到浙江萧山，与沈剑龙经过几乎一整夜的谈话，最终达成和解。

于是便有了11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轰动一时的三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沈剑龙与杨之华正式脱离婚姻关系、瞿秋白与杨之华正式结合恋爱关系、沈剑龙与瞿秋白正式结合朋友关系。这三则启事持续刊登了三天，瞿秋白与杨之华于11月18日结婚。

瞿秋白温文尔雅，博学多识，杨之华朝气蓬勃，热情开放，她与瞿秋白在相互鼓励、扶持中携手走过了10年的岁月，他们的爱情，是夫妻与战友的双重结合。两个人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建立的爱情，造就了中国革命历史的一段佳话。

我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20多岁作为记者、翻译赴莫斯科工作，从事党的早期理论探索，大革命失败后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长为一位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理论家。1935年被国民党拘捕，拒绝劝降出卖信仰和灵魂，英勇就义时年仅36岁。



瞿秋白狱中手书。

坚持真理的革命斗士

说瞿秋白是革命斗士，源于他敢于坚持真理的担当精神。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北伐战争的形势和国共统一战线等问题。会议的中心议题实质是根据北伐战争的形势，制定党的主要斗争策略。主持会议的陈独秀认为当时政治形势发展的特点是联合战线有分裂的危险倾向，并提出了七项挽救破裂的策略，其重点就是要中共从各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使之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同右派势力作斗争。这实际就是把与右派斗争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身上，甚至主张把一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也交给汪精卫来领导。

其间，瞿秋白因肺病复发，只能抱病一边工作，一边休息。养病期间，针对汉口特别会议为了维持统一战线的“特别政策”，瞿秋白开始对党内正在形成的右倾错误产生了警觉，开始整理自己从1923年1月至1926年12月在报刊上发表的重要政治论文及部分文艺著作，拟自编一本《瞿秋白论文集》，力求从根本上、理论上阐述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共领导上海工人举

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二次武装起义，因陈独秀等人把武装起义的领导责任让给资产阶级和准备不充分均告失败。之后，瞿秋白赶到拉斐德路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晚，出席中央和区委联席会议，连夜起草《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提交中央特别委员会。2月25日至3月2日，出席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讨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问题，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经过30个小时的英勇战斗，上海工人阶级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占领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半个月、大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1927年4月27日召开了党的五大。让陈独秀想不到的是，体弱多病、书生意气的瞿秋白早就做好了挺身而出的准备，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抗争。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在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该书列举了1923年至1927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17例，矛头直指陈独秀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义薄云天的革命英烈

产党的胜利，就是国家前途的光明。”瞿秋白还列举大量事实，向他们宣传中央苏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成果，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污蔑。6月14日瞿秋白在他们来“辞行”时说：“劳了你们远道而来，几天来费尽心机和口舌。我的态度，昨天都谈得一清二楚，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的！”第二天这两人灰头土脸返回了南京。陈立夫恼羞成怒，立即发电报给在武汉的蒋介石，说瞿秋白不可挽救，宜速对其处极刑。6月17日中午，蒋介石又直接给宋希濂发出将“瞿秋白就地处决”的电令。

据当时天津《大公报》的报道说，记者曾赶到瞿秋白被扣押的卧室，见到了他书写的“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的辞世绝笔。行刑前，瞿秋白先到实施处决县城的中山公园中山亭留影，泰然自若漫步走向刑场，一路上高唱《国际歌》《红军之歌》，喊着“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从容不迫，面无惧色。到达刑场后，盘膝而坐，慷慨就义。（据央视新闻、《学习时报》）

一颗未拉响的“光荣弹”

陈克昌，1903年出生于长兴县长湖乡（今属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泗安镇），1945年为掩护战友转移而牺牲。陈克昌烈士家属在拆建老房子时，在墙体内发现了一颗手榴弹。奇怪的是，这颗手榴弹的柄很短。经熟悉陈克昌的老同志辨认，确认这是陈克昌烈士生前随身携带的手榴弹。将柄截去一节，目的是在不得已时可以与敌人同归于尽，所以也称“光荣弹”。

1937年11月25日，侵华日军攻占了长兴县城，大肆烧杀抢掠。长兴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年们，自发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长湖乡有一支“长兴人民抗日义勇游击队”的地方武装，于1938年3月成功地袭击了驻大云寺的日军据点，打响了长兴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陈克昌手持打猎的土枪，也勇敢地参与了这次行动。

1943年秋，新四军第十六旅挺进长兴，长兴县党组织迅速得到恢复，民主建政工作也开展起来。陈克昌不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担任了中共长湖乡党支部宣传委员、长湖乡抗日民主政府乡长。

在陈克昌带领下，长湖乡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成为当时根据地建设中的标杆。在随后的泗安战役、天目山反顽战役中，为支援前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10月新四军苏浙军区北撤后，陈克昌留守当地坚持斗争，不幸被捕。敌人威逼他，要他带路去抓捕其余留守人员。陈克昌将计就计，表面带着还乡团前去抓捕，实际用暗号通知地下党员李勋章赶紧逃离。等到还乡团明白上当时，李勋章已经安全转移。

恼羞成怒的敌人残忍地将陈克昌杀害于原长湖乡路西村，他牺牲时年仅42岁。为了战友，陈克昌选择了牺牲自己，此时，他的家中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在火化他的遗物时，时年13岁的儿子陈海和偷偷地将移交总册的封面留存了下来。（据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

鲁迅的育儿经

1929年9月，鲁迅49岁那年，许广平生下周海婴，他们对此迟到人间的天使、爱情的结晶非常疼爱。1931年冬，鲁迅还特意写下《答客诮》一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如许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犹龙。”并书赠友人，表达了他的喜悦心情。

鲁迅在教子问题上一直认为，要教育好孩子，必须先要理解孩子，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同时指出：家长应该了解孩子的世界，理解他们的需求和兴趣，尊重孩子的个性。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提到这样一件事：一次，她去鲁迅家做客，鲁迅从福建菜馆叫菜，有一碗是鱼做的丸子。海婴一吃， just 说不新鲜。许广平认为儿子瞎嚷胡吵，便又炖了一个给他。不料，海婴吃完又说还是酸的。许广平有些恼怒，责备了几句，海婴撅起了小嘴，老大不快。这时，鲁迅便把海婴碟里的鱼丸拿来尝了尝，果然不是新鲜的。鲁迅因此颇有感慨地说：“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鲁迅疼爱儿子，但他并未一味偏袒、溺爱，而是尊重孩子，认真倾听，努力了解事情的真相，正确引导孩子健康成长。

鲁迅由此联系到社会现实，在探讨家庭教育中，是“打孩子好”还是“夸孩子好”时，他在1933年发表的《上海的儿童》一文中阐述：“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鲁迅最后下结论说，这是中国教育的普遍危机，但我们的家长却少有清醒的认识。

鲁迅先生的育儿经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据《人民政协报》）

徐向前：送妻子的生日礼物

一位曾在徐向前身边工作近9年的秘书回忆，徐帅9年里除军队发的衣服外，只在1964年夫妻俩每人做过一件呢子大衣，以后再没添置过新衣。身为共和国元帅、党和国家领导人，他除了在正式场合外一般都身穿便服。在大量的史料照片中可以看到，他经常穿着“打补丁”的便装。

有一年，徐向前的妻子黄杰过生日，徐向前问她：“过生日了，你要什么礼物呀？”黄杰想了想说：“我也不要别的了，就是你当元帅以后，我从来没见过你穿元帅服什么样，你就穿上让我看一眼就行了。”对她这个出人意料的要求，徐向前答应得很痛快，他麻利地穿上元帅服站在老伴儿面前，模特般地展示了一番。从此以后，那件象征着他一生荣誉的元帅服就再也没见他穿过了，一直静静地压在徐家的樟木箱里。（据《天津日报》）

沈尹默引荐陈独秀进北大

1907年，沈尹默在杭州认识了陈独秀。多年后他在《我和北大》一文中回忆道：“有一次刘三招饮我和士远，从上午十一时直喝到晚间九时，我因不嗜酒，辞归寓所，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刘三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间，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写得很好，字则其俗入骨。’这件事隔了半个多世纪，陈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我和陈独秀从那时订交，在杭州的那段时期，我和刘三、陈独秀夫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1917年1月，在北大任预科国文教授的沈尹默逛琉璃厂时偶遇陈独秀。故友重逢，心情激动，两人把话旧，相谈甚欢，得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因要和东亚图书馆合编一部辞典，此次来北京是筹款。沈尹默回到北大后立即找到校长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出任北大的文科校长。蔡元培早就想引进有新思想的人才，便亲自找陈独秀谈。陈独秀此刻的心思都放在《新青年》上，不想到北大任教。最后蔡元培应允把《新青年》也搬到北京来，他才同意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从此，《新青年》在北京竖起了新文化的大旗，旗下汇集了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拉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据《联谊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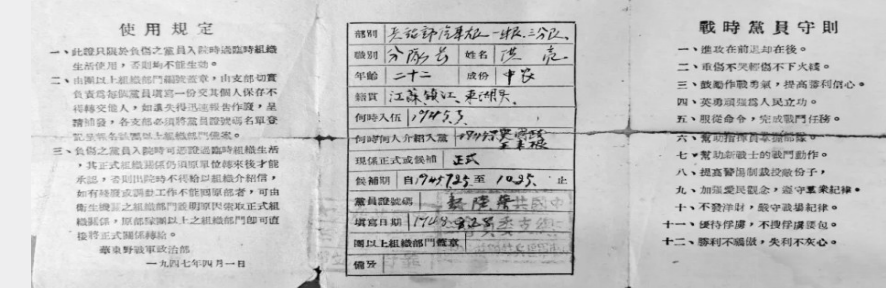
一本映照不变初心的《中共临时党员证》

湖北革命军事馆筹建办公室的文物库房中存放着一本《中共临时党员证》。这本证书为3折页结构，其正面第一页上印有鲜红的党旗和“中共临时党员证”七个大字，第二页上印有镰刀、铁锤和五角星图案，第三页上印有“全心全意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十四个大字，内页印有十二条“战时党员守则”。

湖北革命军事馆筹建办公室工作人员周泽楠介绍，这本《中共临时党员证》的持证人是新四军老战士洪亮。2023年捐给军事馆之前，这本证书已陪伴洪亮走过了漫长的75年。

“一、进攻在前，退却在后。二、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三、鼓励作战勇气，提高胜利信心。四、英勇顽强，为人民立功。……十二、胜利不骄傲，失利不灰心。”近日，记者在湖北省军区武汉第六离职干部休养所采访了洪亮老人，98岁的老人家背得出《中共临时党员证》上的每一条“战时党员守则”。

据史料记载，1947年华东战场上，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为了避免伤



洪亮老人的《中共临时党员证》内页。

员因部队转移失掉组织关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印制了《中共临时党员证》，并作出规定：“此证只限于负伤之党员入院时过临时组织生活使用”，要求共产党员参加战斗时随身携带。

1948年9月28日，部队把《中共临时党员证》发给洪亮，22岁的他当时是华东野战军兵站部汽车大队一中队三分队分队长。老人回忆，虽然他幸运没有受过伤，但战时部队流动性大，出示《中共临时党员证》，他不仅能证明自己

是共产党员和解放军战士，在执行任务时也能获得地方党组织和我军其他部队的大力支持。《中共临时党员证》陪伴他参加淮海战役，陪他随部队渡过长江，一直打到上海。1949年7月，他又随部队转战大西北，参加了解放新疆的战役……无论战斗多么激烈，这本《中共临时党员证》，一直被他当作宝贝，小心翼翼地珍藏着。

洪亮老人回忆，在晴天里，他将这个证放在贴身衣物的口袋里；雨天时，